

广义文字研究

黄亚平 白瑞斯 王霄冰 主编

最早的文字

[美]丹尼斯·斯曼德-贝茜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著
王乐洋译 黄亚平校订

文字是怎样产生的？过去的学者们把艺术称为独立的发明，其实艺术本身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毕竟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字系统都是在不同的时期独立发展的。例如：一个系统——中国的象形文字——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纪刻在羊的肩胛骨或龟甲上的古老符号，在当时它们是一种通神的方式。大约一千年之后的中美洲，又出现了另一种独立的文字系统。这种文字系统把简单的数字符号系统与复杂的象形文字系统结合起来，它的作用主要是依据精细的历法体系来记录各种事件的日期。

相比较而言，汉字和玛雅文字发明得都比较晚。肯定有一种最早的文字系统，我们可以从这一源头追溯艺术的雏形。人们通常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是最早能够书写的人。在公元前第四个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像乌鲁克(Uruk)这样的苏美尔城邦的官员们就发明了数字系统、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系统，这些都记录在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的泥板上（图画文字是对它想要表现的事物的真实描画，这种描画多多少少是真实性的；而象形文字则是一种抽象的符号）。

1929至1930年间，尤里乌斯·乔丹(Julius Jordan)领导

着一群德国考古学家在乌鲁克发现了许多这些古老记录的例子。亚当·法尔肯斯坦因（Adam Falkenstein）和他的学生首先对其中的大约一千个字进行了分析。现在，新的发现使乌鲁克和乌鲁克型文字的数量增加到四千个左右。继法尔肯斯坦因之后，主要是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汉斯·J·尼森（Hans J. Nissen）和它的同事玛格丽特·M·格伦（Margaret M. Green）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乌鲁克抄写员所用的粘土板是平板，因为“板”这个字含有“平”的意味，而实际上它们是凸起的。单个的文字都是用一头钝、另一头尖的木质、骨质或象牙质的针状“笔”刻压在粘土板上的。这些文字基本分为两类：数字是压在粘土板上的，其他的如图画字和象形字等是用“笔”的尖头刻划在粘土板上的。乌鲁克抄写员使用的文字数量庞大，据估计单体字符绝不少于 1500 个。

任何关于文字起源的猜想都假设文字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文字的最初阶段是图画字，随着时间的发展，又或许是因为抄写员的不认真，文字变得越来越有示意性。乌鲁克粘土板上的文字却与这一观点相矛盾。1500 个字符（法尔肯斯坦因认同其中的 950 个）中的大部分都是完全的抽象表意字；而表示野生动物的字如狼、狐狸或表示先进技术的字如战车、雪橇则数量很少，且是图画字。诚然，乌鲁尔文字中还有大部分没有被释读，对古文字学家来说也还是个谜。只有少量的象形字可以从后期已经被释读的楔形文字中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推导出古苏美尔文字的原型。从这些文本片段我们可以推测出乌鲁克的抄写员主要记录的是商业交易和土地买卖情况。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面包、啤酒、绵羊、牛和衣服。

在乔丹发现了乌鲁克文字之后，其他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

亚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字。在伊朗的苏萨 (Susa)、科哈弥撒 (Chogha Mish) 和遥远的果丁特普 (Godin Tepe, 距乌鲁克北部大约 350 公里) 还有更多的发现。最近几年，在叙利亚的哈布巴卡比拉 (Habuba Kabira) 和杰贝尔阿鲁达 (Jebel Aruda 距西北部约 800 公里) 也有类似乌鲁克文字的粘土板出土。乌鲁克粘土板是在一座寺庙的综合建筑物里发现的，其它的则多是在私人房屋的废墟中发现的。后者中有图章和有图章标记的泥质瓶塞，这些都与商业活动有关。

乌鲁克文字的出现与最早的文字都是图画文字的假设正好相反，因此古文字学家们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粘土板上有现在已经知道的最早的文字，但它们肯定是代表了进化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现在的进化已经是高级化了的样式。关于图画文字的假设又一次复苏。如果早期的文字都只是记录在易腐烂的媒介上，例如：羊皮纸、莎草纸或木头，那么公元前 4000 年或更早的时期，与乌鲁克相似的文字从未出现过，这一结论就值得怀疑了。

我有一个较好的提议：过去几年对近东粘土块的早期作用所做的研究表明，乌鲁克文字所用的物理材料有一些特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线索，可以让我们发现哪些有形状的符号确实存在于古苏美尔文字之前。这些线索包括：作为文献物质材料的粘土的选择，凸面乌鲁克粘土板和记在上面的文字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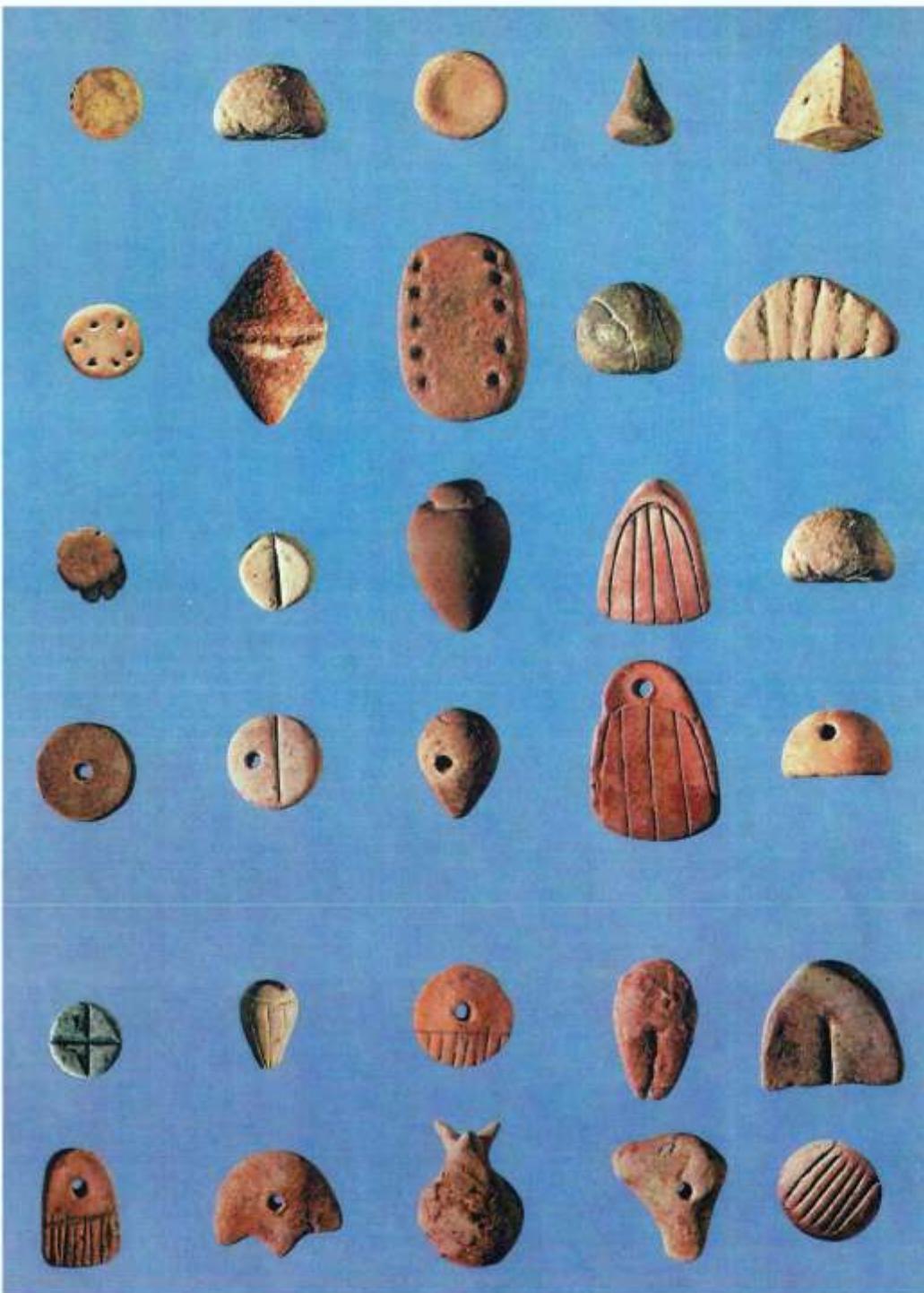
1927 年至 1931 年间，美国东方研究所在巴格达发掘出公元前第二个千纪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城市遗址努兹 (Nuzi)。大约三十年后，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莱奥·奥芬海因姆 (A. Leo Oppenheim) 在审核了努兹宫廷档案的分析报告后报道存在一种使用“筹码”或符号块的记录系统。根据努兹文本，

那些符号块是用来记账的，是“存放”、“转账”和“消账”用的。

奥芬海因姆考察了努兹档案中的一种双重的记账系统。抄写员有一套精细的楔形文字记录系统，宫殿管理者有另一套与之并行的实际账目系统。例如，一种特定的符号块可能代表着宫殿畜群中某一种动物。当春天有新的动物出生时，与之对应的新符号块就会加进去。当动物被屠宰时，与之对应的符号块的数量就会减少。因剪毛或其他原因，当动物从一个放牧人手里或牧场转移到另一个放牧人手里或牧场时，这些符号块也可能从一个架子转移到另一个架子。在宫殿废墟发现的一块蛋壳形中空粘土块证明了奥芬海因姆的猜想是正确的。这个粘土块表面上的文字是48种动物的名单。这块中空的粘土块还发出嗒嗒的响声，当小心地打开其中的一头，人们发现里面有48个符号块。大概文字名单与可数的符号块的组合代表着把动物从宫殿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些符号块具体代表什么的确切记录，它们随后就丢失了。

努兹档案可以注明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伟大的埃及遗址—苏萨（古埃及王国的首都）比努兹档案还要早1500年。由法国研究员主持的苏萨发掘工作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在1958年奥芬海因姆发表报告之后六年，卢浮宫的皮埃尔·阿米亚特（Pierre Amiet）证实了在苏萨有相似的记账系统存在。苏萨符号块容器与努兹符号块容器不同，苏萨容器是中空的粘土球。阿米亚特把它们叫作“符号盒”（bul-lae），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大约70个。符号盒中的符号块是粘土做成的呈各种各样几何体的模型：包括球体、盘状体、圆柱体、圆锥体和四面体。

阿米亚特的发现其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证明了符号盒和符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出土于伊朗苏萨城遗址的黏土块图片。这些约5000年之久的黏土块现藏于法国国立美术馆（卢浮宫）。顶端第一排五个黏土块表示的形状较为常见，分别是：球体、半球体、圆盘、圆锥和四面体。第二排的黏土块经过精心的制作，上面有切口和压痕标记。第三排和第四排显然是由无孔和多孔的形式构成的相似的黏土块的变体。末端两排的黏土块在形状和标记上呈现出多样性，其中的一些符号与早期苏美尔象形文字相似。

二、起源·形成·演变



蛋壳形符号块：发现于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努兹宫殿遗址中，在它的表面罗列着 48 种动物的楔形文字名单。符号块腹中藏有 48 种筹码，在准备作出精确的描述之前筹码已经丢失了。但努兹档案提示这些筹码是用于结帐的。

号块比努兹的发现至少要早 1500 年，还在于它告诉人们它们与最早的乌鲁克文字处于同一时期或更早。后来，人们确实弄清了，它们的年代要早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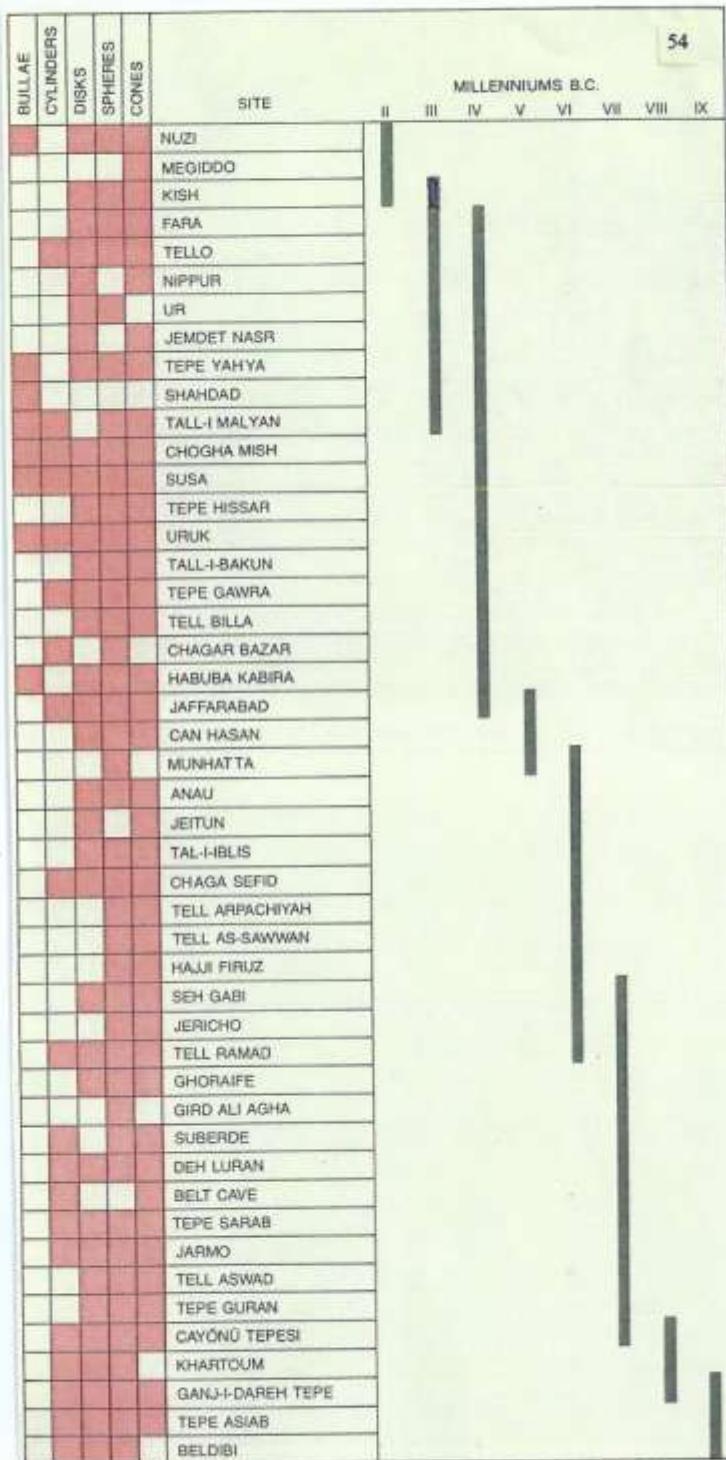
1969 年，我开始了一项旨在揭示近东的粘土最初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被使用的研究。陶器制作无疑是粘土最为人熟知的用途，但在陶器出现之前，人们用粘土制作过珠子、塑像、砖和研钵。研究初期我拜访了美国、欧洲和近东许多城市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收藏了公元前七千年、八千年乃至九千年前的粘土制品。远在 11000 年至 8000 年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最早的农舍已在西亚稳定地建立了起来。



球形符号盒：一种内装符号块的黏土封套，出土于公元前第三个千纪伊朗中南部印度河谷以及低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哈亚（Yahya）遗址的人工土丘中。三个黏土块被装入符号盒之中：一个圆锥体、两个球体。



苏萨出土的黏土盒表面有两排压痕，在数量和形状上与之相配的黏土块包含一个大圆锥体，三个小圆锥体和三个盘状体。黏土块上刻的符号及其符号的演进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粘土块出土地点：时间跨度从公元前第九个千纪到公元前第二个千纪。跟四种基本形状一样多的 20 种变体粘土块出现在最早的遗址中。在公元前第四个千纪以前，装有粘土块的粘土封套还没有出现。

在博物馆的藏品中，除了我想要找的粘土制的珠子、砖和塑像之外，我还意外地发现了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物体：用粘土制成的各种形状的小玩意。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与阿米亚特在苏萨符号盒中发现的东西：球体、盘状体、四面体、卵形体、三角形（或新月形）、双圆锥体（两个圆锥体在底部相连）、长方形和其他难以形容的奇怪形体有些相似。这些手工制品，甚至是那些比苏萨符号还要早五千年的东西，也曾经是符号块吗？

我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些东西编成目录，把每一个已经知道来源的符号块列入一个特定的位置。我发现尽管它们都很小，最大维度的平均长度在1厘米到2厘米之间，但很多形状相同的物体尺寸却相差很大。例如：有的小圆锥体只有大约1厘米高，而大的却有3至4厘米高。还有的盘状物薄的只有3毫米厚，而厚的却有2厘米厚。一些符号块有明显的形状变化，例如：除了完整的球体之外，还有四分之一球体、二分之一球体和四分之三球体。一些符号块还有其他特点，很多符号块表面刻有深槽，一些有小的粘土球或圈状物，另一些有浅浅的圆孔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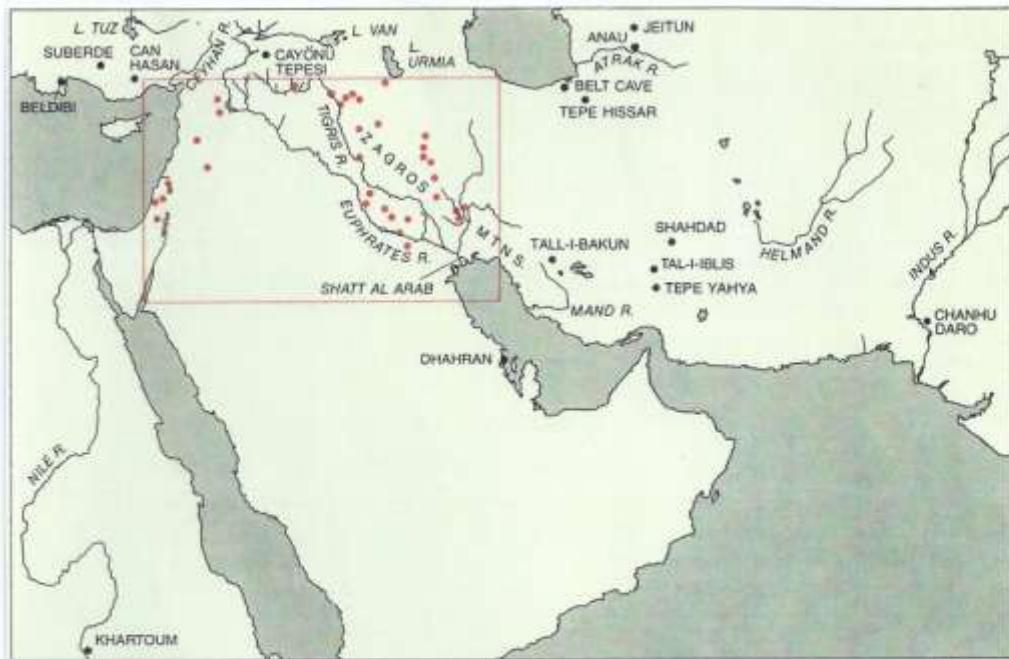
这些符号块都是手工制成的，一块粘土或者在手掌间被卷成卷儿，或者在手指尖被挤压。粘土的质地很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事先经过特殊的处理（例如添加回火物质，在陶器制作中可以提高锻烧后的硬度）。然而，所有的符号块都经过锻烧，以确保它们的持久性。大多数符号块的颜色在浅黄色和红色之间变化，只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灰色甚至是黑色。

我发现，事实上所有博物馆西亚新石器时代的藏品中都有这些符号块出现。数量非常丰富的例子是伊拉克加尔摩（Jarmo）的早期村庄遗址，它最早出现在8500年前。加尔摩出土了1153

个球体、206 个盘状体和 106 个圆锥体。报告大体上表明遗址的各个地方都有房屋，而这些符号块是分散在房屋的地板上的。如果这些符号块曾经被装在篮子或袋子之类的容器中，那么这些容器则在很久以前就碎裂了。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块与其他手工制品是分开摆放的，甚至暗示了它们的作用。报告表明：许多符号块是 15 个一组或更多，它们都在房屋里的储藏区。

当我查阅博物馆的藏品和有关的遗址报告时，我越来越对这些符号块的普遍存在感到疑惑。西边最远的贝尔迪比（Beldibi）（现在在土耳其的西南部）遗址中发现过，东边最远在山胡达罗（Chanh Daro，即现在的巴基斯坦）遗址中发现过，甚至在靠近卡尔图姆（Khartoum）的尼罗河上的公元前 8000 年的遗址中也有出土。同时我也发现，有些遗址报告没有把找到的符号块记录在案，或者只是随便提到了几句。当记录这些符号块时，标题很可能是“目的不确定的物体”、“儿童玩具”、“游戏工具”或“护身符”。例如：在伊拉克特罗（Tello）发现的符号块被发现者——亨利·德·吉努依拉克解释成居民们想要表达“个人身份”的护身符。另一个例子出现在卡尔莱顿·库恩（Carleton S. Coon）关于伊朗贝尔特山洞（Belt Cave）的报告中：“在第 11 层和第 12 层发现了五个神秘的……粘土制品，它们看起来像药品中的栓剂。它们的用途还不得而知。”

当它们在所有的遗址报告中出现时，通常并不是被列入同一个标题之下，而是根据形状列在几个标题之下，因此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同一类东西。例如：圆锥体被解释成有一定意义的女人塑像、生殖器崇拜的符号、游戏工具、钉子，而球体则大多被解释成弹子游戏或弹弓用的弹子。



粘土块的地理分布：北边远至伊朗里海边境，南边远至卡尔图姆（Khartoum），由亚洲次大陆向东直到印度河谷。用一个小矩形包围的部分的遗址用圆点标注，这部分的详细说明见下图。



城市群遗址分布：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和下游、幼发拉底河下游以及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这更加表明了这项研究的有效性，而不仅仅是找出了使用符号块的地区的实际的分布广度和密度。

在卢浮宫做完研究之后，我已经非常熟悉阿米亚特的工作了。然而，在把成百上千的符号块编成目录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些符号与阿米亚特发现得更早的苏萨粘土制品是那么的相似。起初，把这两组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块与苏萨铜器时代的符号块至少要相差 5000 年。当我把调查进一步扩大，把公元前第七个千纪至第四个千纪的粘土制品也包括进来时，我惊喜地发现，在代表了整个时间跨度的许多遗址中我都发现了大量相似的粘土符号块。很显然，使用符号块的记账系统不仅在努兹和苏萨被广泛使用，整个西亚从公元前第九个千纪到公元前第二个千纪都在使用。

这一系统似乎与很多其它早期甚至可能并非早期的记账方式非常相同。研究古典的学者们对罗马用卵石来“计算”（拉丁文是 *calculi*）的系统非常熟悉。直到 18 世纪末，英国财政部仍然用筹码来计税。因为这个原因，今天伊拉克牧羊人也在使用卵石来计算畜群中的动物数量，算盘仍然是亚洲市场上的标准计算工具。西亚古老的符号系统只不过比后来的更复杂一点罢了。

从总体考虑的话，这一系统可以分成 15 个大的类别，还可以根据尺寸、标记或部分的变化，如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球体，再进一步分成大约 200 个次类。很明显，每一个特别的形状都有自己的意义，一些代表数字，而另一些代表具体事物，特别是商品。

没有必要对符号块加以理论化说明，乌鲁克泥板上的大量二维平面的象形文字几乎都是根据这些符号块再造出来的。例如：乌鲁克代表数字的符号是任意性的，一个小的锥形印痕代表数字 1，一个圆形印痕代表 10，一个大一些的锥形印痕代表 60，这些印痕都有小圆锥体、球体和大圆锥体符号块与之相匹配。其他有符号块和与之相匹配的象形文字的例子还包括：在商品总标题下

TOKEN TYPE I	I SPHERE	II DISK	III CONE	IV TETRAHEDRON	V BICONOID	VI OVOID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 NUMERAL 11	● SEAT	▽ NUMERAL 1	△ TETRAHEDRON	◇ GOOD, SWEET	○ NAIL	
● NUMERAL 10	○ GARMENT, CLOTH	▽ NUMERAL 80	△ PI	◇ LEGAL DECISION, TRIAL, PEACE	○ OIL	
○ NUMERAL 10	● GARMENT, CLOTH	▽ NUMERAL 500	△ ←	◇ HEART, WOMS	○ ANIMAL (UNIDENTIFIED)	
● NUMERAL 100 OR 3,000	● WOOL	▽ BREAD	△ GARMENT, CLOTH	◇ BRACELET, RING	○ BREAD	
○ NUMERAL 36,000	● SHEEP	▽ PERFUME		◇ PLACE, COUNTRY		
● EWE	● EWE	▽ RECTANGLE				56
VII CYLINDER	IX TRIANGLE	XI RECTANGLE	XII VESSEL	XIV ANIMAL	XV MISCELLANEOU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TOKENS SUMERIAN PICTOGRAPHICS
— WOOD	● WOOD	○ WOOD	□ WOOD	● TYPE OF VESSEL	○ DOG	○ BED
● STONE VESSEL	● STONE VESSEL	● GRANARY	● SHEEP'S MILK VESSEL	● COW	● COW	● BED
● METAL	● METAL	● METAL	● TYPE OF VESSEL	● LION		
● HILL	● HILL	● HILL	● TYPE OF VESSEL			
● MAT, RUG	● MAT, RUG	● MAT, RUG				

52个符号块，代表了12个大类别，与最早的苏美尔铭文相对应。大多数文字不能读出来。如果知道了符号的意思，也就可以在英文中找到相应的单词了。与各种球体和圆锥体符号块相对应的苏美尔数字符号实际上就是粘土板表现的压痕。有两个例子（球体）中刻有线条；另一个（圆锥体）有圆孔标记。

代表羊（一个十字外圈有圆圈环绕）的乌鲁克符号与刻有十字的盘状符号块与之相匹配，代表衣服的符号（四条平行线外圈有圆圈环绕）与刻有四条平行线的盘状符号块与之相匹配。还有其他代表金属和油的象形文字，代表牲畜、狗和明显是船的符号则显然是图画字。每个泥板上的符号都有相似形状和标记的符号块与之相匹配。另外，许多仍不能释读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似乎也与其他符号块相匹配。

这些三维符号块为什么会存在呢？早期符号块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这个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新石器时代，早些时候基于打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被种植与动物饲养所代替，农业生存方式逐渐发展。尽管新的农业经济无疑增加了食物的产量，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也许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食物的存储。每年收成中的一部分必须分出来供农业家庭自己生存之用，一部分则要作为来年的种子，另一部分则要储存起来与那些生产其他产品或原料并用它们换粮食的人进行交换。保留分配和交换记录的需要足以激发记录系统的产生。

现今已知的最早的符号块来自于伊朗扎格罗斯地区的两个遗址：阿西亚特普（Asiab Tepe）和甘吉达莱（Ganj-i-Dareh）。两个群落的人们在公元前大约 8500 年的时候仿佛已经开始饲养牲畜了，并且很可能已经开始试种庄稼，尽管同时他们还继续打猎并在野外采集。他们制作的粘土符号块在形式上非常复杂。有四种基本的类型：球体、盘状体、圆锥体和圆柱体。另外还有四面体、卵形体、三角形、四方形、弯曲的圆圈和表意的动物形体。次级分类包括半球体和圆锥体、带有缺口和小孔标记的球体和盘状体。次分类包括 20 个单体符号。

新石器时代以及后来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铜器时代在西亚大约

持续了 5000 年。在此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内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些符号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事实表明这种记录系统是多么适应早期农业经济的需要。大约公元前 6500 年，最早的扎格罗斯农业群落兴起后 2000 年，另一个伊朗村落——特普萨拉博（Tepe Sarab）开始繁荣起来。从那里发掘的符号块总量表明基本类型的数量没有增加，次级分类的数量从 20 个仅增加到 28 个，其中包括一个四面的角锥体和一个很可能代表牛的已经程式化了的牛头骨形体。

在铜石并用时代，每个群落成员很可能通过实物税的方式把剩余农产品集中起来，交到祭司等公共官员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记录成员捐献物的需要显然没有给记录系统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公元前 5500 年至公元前 4500 年曾经繁荣过的四个遗址——伊拉克的特尔阿尔帕契亚（Tell Arpachiyah）、特尔阿斯旺（Tell Assawwan）和伊朗的查嘎色菲德（Chaga Sefid）、加发拉巴德（Jaffarabad）出土的符号只有很小的进展，但出现了新的符号类型——双圆锥体，在一些次级分类中，绘制的黑线条或点取代了缺口和圆孔标记。

铜器时代早期——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100 年间，记录系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因为农业经济的兴起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异常显著：城邦出现了。西亚古代遗址的调查表明，伊朗和伊拉克的人口急剧增长，有许多居民的城邦中心在以前的村落周围开始出现。

手工艺的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时期因铜匠和铜器制品而得名，其他手工艺者也出现了，他们聚集在不同的地区。陶轮促进了陶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各式窑集中烧制的产品也远销各地。石制容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与之相似。伊朗当地并没有天青石，天青石的出现表明了贸易网络的扩大。

基于贸易的城邦经济的发展对传统记录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产品，货物清单、运输和工资支付情况都要记录下来，商人还要把交易记录保存下来。公元前第四个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对复杂的商业记帐符号系统的要求呼之欲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符号和怎样使用符号。

我们先谈谈符号，伊拉克（乌鲁克、特罗和发拉）、伊朗（苏萨、柯戛弥撒）、叙利亚（哈布巴卡比拉）六个公元前第四个千纪晚期遗址中已出现代表早期形状的所有符号块。另外，也出现了一些新形状，例如：抛物线、菱形和代表容器的形状。然而，比新形状出现意义更重大的是次级分类的扩大——符号块上的刻痕更加丰富多彩了。也有一些符号块带有装饰标记：粘土制的小球或圈状物。

这六个遗址中有 660 个年代约在公元前 3100 年的符号块，其中 363 个（占 55%）有刻划符号。大多数刻划符号是由尖头的“笔”刻划成的深槽，非常显眼，且呈清晰的对称形。在球体、圆锥体、卵形体和圆柱体等圆形符号块的表面上，刻痕通常都在“赤道”上，从任何角度都能看见。在盘状体、三角形和四方形等平面符号块的表面上，刻痕只在一面出现。

尽管也发现了十字形或类似于十字形的刻痕，但大多数刻痕都是平行线。平行线的数量并不是任意而为的：有的多达十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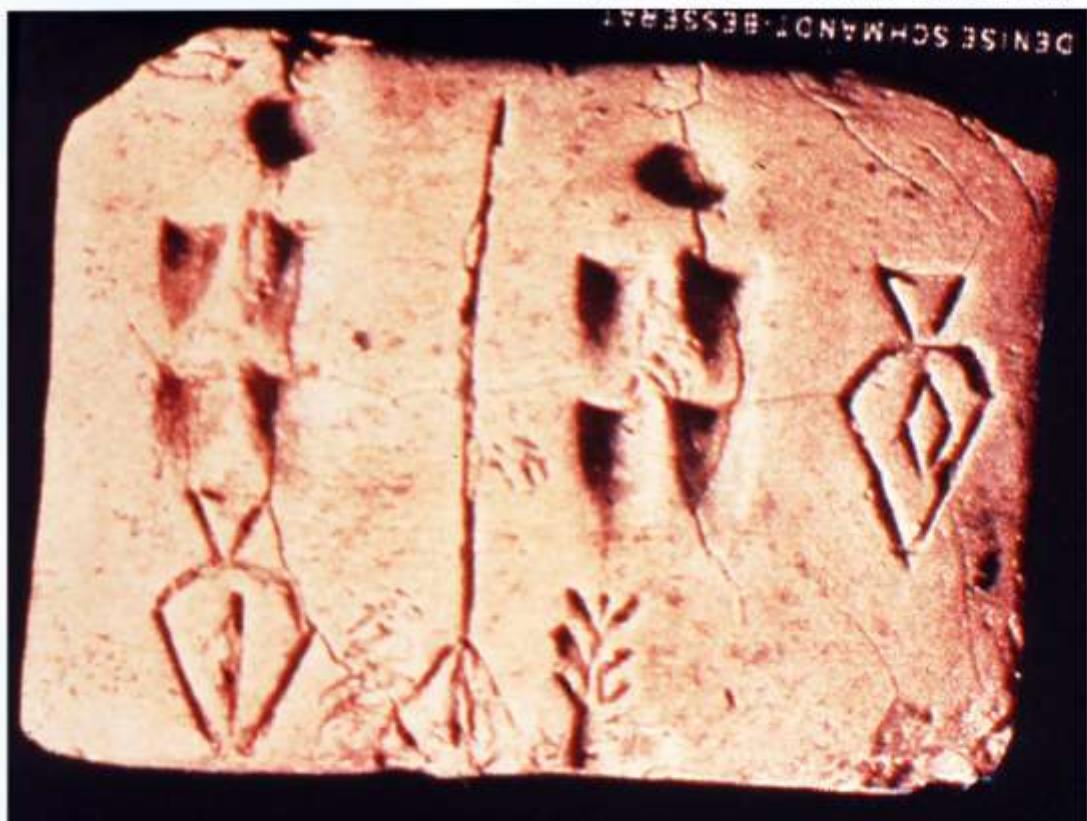


未打开的符号盒的 X 光图明显可以看出内部有一些圆锥体和卵形体。符号盒的年代尚不清楚，这只是单独的一个表面，是在沙特阿拉伯的达兰 (Dhahran) 附近找到的。

但最常见的是一条、两条、三条和五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两条平行线之外，最常见的是平行线条数都是奇数。

尽管到目前为止刻划的模式最为丰富，但符号中有 26 个（占总数的 4%）明显是由一头钝的“笔”压制而成的圆形印痕。有些压制的符号有一个印痕，另一些则有六个为一组的印痕，或排成单行，或排成两行，每行三个。

关于符号块用途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 198 个（占总数的 30%）有孔洞标记。有孔洞的符号块在所有的类型和无标记、刻划和压制的次级分类中都有出现。实际上这意味着任何大类和次类的符号块都是既有打孔标记的，也有无孔标记的。孔洞非常小，只能容一根细绳通过。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所有 15 个类别和 250 个次类别中的符号块只不过是铜器时代西亚城邦人群挂在脖



乌鲁克粘土板是凸形的，很可能是由中空的符号盒演化而来。压制的符号代表数字。这些粘土板现在存放于柏林的帕尔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内。

子上或手腕上的护身符。我并不同意这种解释，原因有二：第一，我考查过的打孔符号块中没有任何一个有证据表明它们是做护身符用的，例如：抛光或孔洞的磨损等。第二，形式如此复杂、地理分布如此广泛、制作又如此统一，但 30% 用作个人装饰而余下的 70% 则另有他用，这说起来也太荒谬了。

我更倾向于下面的假设：代表具体交易的符号块被穿成串作为记录之用。城邦经济记录的复杂性使适合穿成串的符号块加倍增长，至少这一点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如果打孔的符号块意味着要穿成串的话，那么这就是公元前第四个千纪末这些粘土符号块用途的一种改变。意义更加重要的改变是粘土符号盒或封套的出现，符号盒或封套指的就是阿米亚特在苏萨发现的符号容器。符号盒的出现直接证明了使用者想要把代表交易的符号块隔离开来。封套制作简便，只要用手指在网球大小的一团粘土中一压，就可以弄出一个足够容纳好几个符号块的洞，然后再用粘土封口。

我并不怀疑符号盒的发明是为了让交易双方都有一个平滑的表面来印上私人图章以供确认之用，这是苏美尔人的习俗。到目前为止发现的 350 个符号盒中大多数都有两种不同的图章印痕，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设想。阿米亚特解释说苏萨的符号盒可能是装载货物的清单。举个例子说，一个农村的纺织品生产者想要委托别人把货物运到城邦的中间人手中，他就会随货附上一个符号盒，盒中装着代表货物数量和质量的符号块，接货人打碎符号盒就可以验货了；并且运输一个完整的符号盒还以防止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商品。这种商业伙伴间盖图章的交货途径代表了一种使用古代记录系统的全新方式。

这种发明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印在符号盒光滑表面上的图章是确认每次交易用的，但如果要保存这些印痕，符号盒就必须是

完好无损的。当时是怎样确定里面的符号块是什么？并且有多少数量呢？这一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符号盒表面也作了标记，这样即可以保存图章的印迹，里面所有符号块的形象也可以留在表面上了。

这一方法最鲜明的例子是一个已经证明里面装有六个刻有深槽的卵形体符号块的符号盒。这六个符号块在被装入符号盒之前都在表面留有压痕，里面装的符号块与表面的压痕完全吻合。然而这意味着在符号盒表面记录盒内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普遍采用的方法。在大多数符号盒上压痕是用姆指或“笔”压成的。一个圆形的压痕代表球体或盘状体，半圆形或三角形压痕代表圆锥体，以此类推。

符号盒上的标记显然并不是用来代替保存记录的符号系统的。尽管如此，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起初，这种创新因其简便而大行其道，任何人都能“读”出符号盒里装了些什么，而不必弄坏封套和图章印痕。之后的事情就是顺其自然，由二维平面符号代替立体符号块这才是古代记录和文字系统至关重要的环节。内装符号块的中空的符号盒很可能被写有文字的诸如泥板之类的粘土物体代替。档案中那些被绳子穿起来的、放在篮子中和货架上的符号块后来很可能让位给了写在粘土板上的象形符号，换句话说就是让位给了书写记录。

早期乌鲁克粘土泥板的凸形面继承的很可能恰恰就是球形符号盒的形态特征。粘土不仅柔软，而且写在上面的字也容易被涂抹，要想保存必须经过晾晒或烘烤，之所以选择这种物质作为书写表面，其原因也可能与上面提到的完全相同。符号块的造型以及标记与许多之前假定为任意性的乌鲁克象形文字符号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没有什么怀疑了。象形文字与二维平面符号完全相同的至少有 33 对，可能相同的多于 2 倍。

综上所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并不是像许多人假设的那样是纯粹发明的结果。相反，它们似乎是西亚公元前第四个千纪对固有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记录系统的新应用。这种观点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出现，代表了起源于 11000 年前的记录系统演进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发展阶段。

我们假设这一系统在公元前第四个千纪以前都没有任何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在 5000 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记录保存的要求相对简单。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大规模贸易的发展，人们对这一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符号形象取代了符号块本身，象征物逐渐演化成了象形字，文字在整个西亚迅速传播开来。